

# 宏观测度的边界悖律及其意义<sup>\*</sup>

邱东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本体论、认识论和边界操作意义上的宏观测度边界, 提出了宏观测度边界悖律的理论命题, 分析了形成测度边界悖律的深层次原因和宏观测度越界的可能后果, 强调了明确宏观测度边界悖律的意义, 探讨了核算范式转换问题和替代测度的有效性问题。

关键词: 宏观测度; 边界; 悖律

中图分类号: F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565(2012)08-0083-08

## The Boundary Antinomy of Macro-measurement and It's Significance

Qiu Dong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Macro-measurement at the meaning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practice,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of the boundary antinomy of Macro-measurement. The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ep-seated causes of the Boundary Antinomy Macro-measurement and possible consequences of overstepping boundaries of Macro-measurement and ends up with emphasizing significance of specifying the Boundary Antinomy of Macro-measurement and discussing particularly transformation of accounting modalities and effectiveness of substitute measurement.

**Key words:** Macro-measurement; Boundary; Antinomy

本文所说的宏观测度(Macro-measurement)是广义的社会测度,包括经济测度、狭义的社会测度及其与社会经济现象相关的环境测度。

宏观测度究竟有没有边界? 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宏观测度有着怎样的边界? 如果测度边界可从不同角度来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人们在涉及测度边界的问题上有哪些经验和教训? 认识这些边界的意义又如何? 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 一、本体论意义上的宏观测度边界

宏观测度应该是有边界的。这首先可从本体论意义上来探讨,而本体论意义上的不可测度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 因事物本身不存在或尚未发生而不可测度

比如,按照 PPP 的概念定义,货币购买力比较应该是其所有交易对象(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之比。然而在不同国家间,交易对象存在着空集, A 国有的交易, B 国没有,或者反之。交易的缺失造成价格的缺失,其比价自然也就是不可测度的。这种国家或

地区“特征商品”的例子有很多,比如韩国的狗肉价格无法与欧美比,欧美的牛肉价格无法与印度比,而在穆斯林国家,则根本没有其他国家随处可见的猪肉价格等等。在种种情况下,单个交易对象的比价根本就不存在。而特征商品的交易又往往是其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计算 PPP 的微观基础就缺失了相当一块。总而言之,购买力比价其实只能是一个不完全的总比价,但 PPP 的代表品计算法恰好掩盖了这一点。

又比如,可持续发展如今得到了普遍的重视,许多机构和学者提出种种方法要测度发展的可持续性。然而严格论之,测度针对的只应是已经发生的事物,对尚未发生的事物则只能是估计(Estimation)。一个事物是否可持续,人们的预见能力再强也不能断言。可持续性其实是不可测度的,只能加以估计。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对测度和估计作这样一个对象上的区分,有利于人们更深刻

<sup>\*</sup> 本文系 2009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统计数据质量管理研究”(09&ZD040)阶段性成果。

地认识宏观测度的边界。

## (二) 事物虽已发生但仍然无法测度

我们以休闲为例来说明这一点。现代社会对休闲越来越重视,于是有社会机构和学者提出休闲时间的测度问题。他们把人的活动分为有偿工作、家务生产、个人照顾(吃饭、睡觉等)、学习和休闲五个大类,再把人的各项具体活动归于这五类,从而计算和比较不同类活动的时间利用长短。他们将个人休闲时间作为微观信息的重要基础,进一步为生活水平的宏观测度提供支撑。

休闲当然是现代人类生活非常重要的方面,然而休闲时间真是可测度的吗,人的活动有太多的亦此亦彼性,你不可能把某项具体活动完全归于某一类,即不能保证事物分类所必须具备的排他性要求。

由于现有的活动分类具有非排他性,就无法把各种具体活动的时间(我们且假定其可以确切地加以记录)确切归到上述五大类中。对这么多有交集的活动而言,时间的任意一种切割方式都是武断的。于是,休闲的时间究竟是多少,人们无法测度,只能大概估计。

在宏观测度中,我们常常可以遇到“难以量化”的说法。试想,如果这难以量化的“难”到了相当的程度,这正是现象的不可测度。

我们还可以从语义学角度找到根据。众所周知,名词是用来表述事物的,而名词须区分为可数名词与不可数名词。名词的二分法本身就隐含着一条公理:事物本身有可测度与不可测度之分,这便是从本体论意义上看到的测度边界。

## 二、认识论意义上的宏观测度边界

A·I·哈洛韦尔认为:“测量的意思只不过是这:对一批以朴实的辨别力为基础的量值来说,测量是作为一种鉴定技术来代理匹配运算的<sup>[9]</sup>。”这就告诉我们,计算的实质是比较而不是计算。如果不能就事物的相恰点达成一致,人们就认定对象不可数,即不可测量。T·克伦普也告戒我们:在一种单一度量单位的标准后面所隐藏的观念是异常复杂的<sup>[9]</sup>。这样,我们就涉及到了认识论意义上的宏观测度边界。

历史告诉我们,人们的认知能力总体上处在进步之中。在本体论意义上可以测度的事物中,原本由于人的认知能力低下而无法测度的事物,其中一

部分又逐步成为可测度的了。这表现为在认识论意义上也存在这一条可测度边界,而且,这是一条在逐步扩大的测度边界。

在本体论意义上可测度的事物中,测度方法的创新,正是为了扩展测度的边界。在一种新测度方法提出之前,该方法所针对的测度对象就曾经是认识论意义上不可测度的,处于测度的原边界之外。

比如,在配第之前,统计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国家的态势,但它在方法论上只是定性言说。一个国家的财富总量在本体论意义上是可以测度的。然而只是到了配第时期,人类才想到了要测度它,并发明了如何来测度它的基本方法。政治算术,即开创期的经济统计学,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大大扩展了宏观测度的认识论边界,因而才具有了统计学范式创新的革命性意义。

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当年人口统计学的创新,哪怕今天看起来相当简单的指标方法,却使人口总量及结构等方面得以量化,由不可测度变成了可测度。再比如,投入产出技术使部门间的经济联系变得可测度,资金流量分析使部门间的金融联系变得可测度,当然这些测度都带有一定的前提条件。

新测度方法化不可测度事物为可测度事物,扩展了人类的量化世界。可以说,一部经济统计学或社会统计学的学说史,也就是宏观测度边界的拓展史。事实上,宏观测度本身的内容正是随着历史进程而逐渐扩展的。最早的宏观测度只是最基本的经济指标和人口统计指标,内容较少。到了20世纪20年代,经济指标在宏观测度中大为扩展。而到了20世纪60、70年代,社会统计的测度才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而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环境指标,进入大众的视野就更晚了。

海德格尔提醒我们:“界限并不表示某一事物的发展到此为止,而且像希腊人所认知的那样,界限是某种事物开始展现的地方”。宏观测度的发展史,也即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测度边界向本体论意义上测度边界逐步靠近的历史。

比较一下本体论意义上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宏观测度边界,两者都是可以变动的。当产生新事物或事物本身有新发展,演变出现了可量化的部分,本体论意义上的宏观测度边界就可以扩展了。至于认识论意义上的宏观测度边界,在第一条边界内当然是可以且应该扩展的。而二者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

前者不可人为超越,但后者在第一条边界内则应当鼓励对原有边界的超越。

### 三、操作意义上的宏观测度边界

经由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两轮界定,大大减缩了宏观测度的可行性空间。然而,即便可测度的事物也并不能都去测度。此时我们又应该在这一可行性空间中,或者说在此测度界限内,进一步区分应该测度的事物和不应测度的事物,即进一步界定操作意义上的宏观测度边界。

宏观测度的第三条边界主要是出于相关性和资源约束及其关联的考虑。

我们先来看宏观测度的相关性,这主要是从需求方来界定测度的边界。

人们测度事物,当然是要获得该事物的信息,是为了从数量上认识该事物。然而取得信息本身还不是测度的唯一目的,或终极目的。人们进行测度是要用所得信息来支撑自己的决策。对决策者即宏观信息的用户而言,哪些信息对决策更有用,与决策的相关性大,就应该进入宏观测度的边界之内。

早年间宏观测度信息的用户主要是政府。学者进行宏观测度是为了向政府建言献策,政府统计部门进行宏观测度也主要是政府自产自用。此时的宏观信息相关性比较容易确定。

从20世纪30年代起,宏观测度的用户大大扩展,居民、企业、NGO、国外及国际组织等都要用到一国或地区的宏观信息。政府仍然是宏观信息的主要用户,但已经不是唯一的用户了,宏观信息成为一种公共产品。此时政府统计部门还同时是政府的代表,担负着向社会提供公共信息产品的职责。用户的扩展使测度的相关性变得更为复杂了。各机构部门信息相关性不同,偏好不同,宏观测度的操作边界就是在他们的需求博弈中确定的。

宏观信息只是公共产品的一部分,再富有的国家,用于公共产品生产的资源也仍是有限的。这样就产生了配置问题:如何把资源用在最应该进行宏观测度的事物上。

宏观信息的测度是需要成本的,相对有限的资源而言,该测度的事物总是太多。应对资源约束是从供给方来界定宏观测度的边界。在与宏观信息用户的博弈选择中,有三个因素需重点考虑。

第一,宏观测度通常是常规统计,而不是质的研

究,不是专题调查。常规统计的投入是持续性的,不是一次性的,一旦开始投入就不好放弃。常规统计对频率要求较高,这意味着对投入的要求也高。只有高频的测度,才容易形成样本量足够大的历史数据库,才能满足长期动态比较的质量要求。

第二,不同的事物对测度成本的要求不同。内部差异越大、变动频率越高的事物,越不易测度,采用抽样调查的有效性和可能性就越小,就越需要全面调查,而这将意味着测度成本的大幅提升。有即使即使加大调查成本,仍然不能保证基础数据的数量和质量。故而当用户提出新的测度要求时,首先应该对测度对象进行充分的分析,需查验测度过程究竟可否持续。

第三,微观信息基础究竟如何,这是测度项目确定前需要考虑的问题。统计部门的信息是从微观层面收集起来的。宏观信息的用户,往往同时又是微观信息的持有者。但由于信息生成与使用的脱节,这种二重性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全力支持微观信息的采集。采集的频率越高、个体信息的私密性越强,所得微观信息的数量可能就越少,质量也可能越差。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微观信息基础并不是政府统计部门所能自主控制的。

由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资源配置博弈,最终形成了操作意义上的宏观测度边界。

### 四、宏观测度的三条边界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宏观测度至少有三个测度边界,一是因事物本身可测度性而形成的边界,即本体论意义上的测度边界;再一是由人的认知能力而形成的边界,即认识论意义上的测度边界;第三则是由统计相关性偏好和投入约束而形成的边界,即操作意义上的测度边界。

这三条测度边界,应该以本体论意义的测度边界最大,认识论意义的测度边界次之,而操作意义的测度边界最小。如果用圆圈来表示可测度区域,那就可以有一环套一环的三个圆圈。

W·配第在他的《政治算术》中明确指出:“相反,我却采用了这样一种方法(作为政治算术的一个范例),即用数学总量或者尺度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问题,只进行能诉诸于人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根据的原因,至于那些以容易变动的思想、意见、胃口和情绪为依据的原因,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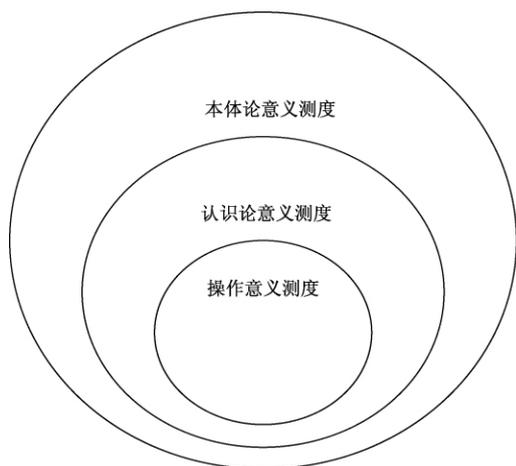


图1 测度边界的示意图

待别人去研究<sup>[4]</sup>。”

对于这段非常著名的论述,人们的注意力通常集中于配第做了些什么。其实,作为经济统计学的范式创新,从“国势学范式”进而到“政治算术范式”,有所作为的另一面往往就是有所不为。配第只是对可以测度的事项进行分析与综合,而对不可测度的(至少在当时条件下)事项,留给别人去研究这里所谓的“别人”,可以是本学科的后人,当然也可以是从事“质的研究”之人。我认为,配第实际上同时也是划出了一条宏观测度的边界。

### 五、宏观测度的越界倾向

宏观测度的边界既是隐形的,又是变动着的,这种不确定性为人类越界测度打开了方便之门。

有史以来的种种启蒙使人类处于向往文明进步的过程中:我知道我不知道,我要知我所不知。人类的求知欲望是相当强烈的,不管不可知,该不该知,都想知道。对某些人而言,想要知道某些方面的事物;对另一些人而言,想知道的又是另外一些事物。将不同人群的这些不同求知欲望叠加起来,整个社会想要知道的事物往往就近乎无所不包了。

自从20世纪60、70年代社会指标运动兴起,指标体系的采用就成为此种求知欲望在测度领域的突出代表。在各种讨论指标体系的场合,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律性现象:人们也会提出某测度不宜进入体系,但更会补充他(她)所强调的另外的测度,二者相比,最终的意见总是“指标添加型”的。指标体系越搞越全面,也就越搞越大。指标体系应该止于何处,人们很难达成一致意见,结果就必

然是什么都要测度。

2009年,由J·E·斯蒂格利茨、A·森和J·P·菲图西主持完成了一项测度研究报告(以下简称之为“SSF测度报告”)。报告中他们用“仪表盘”来比喻指标体系。即使在这个世界顶级专家完成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主张的测度改革仍然是“指标添加型”的。这表明,种种新仪表盘的构建往往让人目不暇接,几乎是漫无边际的。

求知范围的扩展导致了对求知工具的无度使用,测度工具的使用范围也就失去了本来应有的边界约束。在实践中,人们往往误以为所用的测度工具“放之四海而皆准”,忘记了其应用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前提,忘记了事物本身客观存在着的可测度与不可测度的区分,忘记了人类自身在宏观测度上的能力局限,也忘记了宏观测度的资源约束,即应该测度与不应该测度(至少在当下)的区分。

对应于三条边界,所谓“宏观测度越界”表现也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超越了本体论意义的边界,测了不可测度之事物。再一是测度方法的创新和改进似是而非,导致虚假的测度。或者测度方法的假设前提过多,有效应用空间过小,实施的意义不大。将之应用到其有效空间之外,就造成了宏观测度的越界。第三种越界就是测度超出了资源约束,或者相关性不强,从测度整体的资源配置上看,从与其他测度比较的意义上看,此测度相对而言超越了宏观测度边界。

这里要特别注意区分“测度越界”与“测度扩界”两种不同情况。如果测度方法创新或改进成功,那是测度边界的扩展,认识论意义上可测度的范围变大了,边界外移了,测度进入新领地并不是越界。

归结起来,在对大千世界进行数量化表示时,人们的无限求知欲望与事物的有限可知性质发生了冲突,具体表现为测度工具的有限性与人们使用工具时失度的矛盾,即宏观测度的工具自强化性与事物的可测度性相悖,明明存在测度边界,人们却总是超越之,或许我们可称之为“宏观测度的边界悖律”(the boundry Antinomy of Macro-measurement)。

这里用“悖律”(Antinomy,通常多译作“二律背反”,但背反二字系同义反复,且相悖的不一定只是二律,还可能是三律或者更多,故而这里改为此称)而不用“悖论(Paradox)”这个词,是想强调,边

界悖律是一种客观实在的相悖情境,而不仅仅是人们逻辑思维的产物。

## 六、形成测度边界悖律的原因

既然宏观测度越界是一种客观实在的悖境,那就一定有其存在的深层次社会原因,以下五方面因素是其要者。

第一,人类对意义的追求。IBM 研究实验室的物理学家 R·兰道尔(Rolf Landauer)认为,凡不能测量的东西都是无意义的<sup>[8]</sup>。凡事都偏好去搞测度,反映出人类有一种厌恶模糊的特性,从根本上看也就是人类对意义的追求。

认识论意义上的测度边界自身确实具有可扩展性。经济社会现象本身存在着测度边界,但这条边界究竟在哪里,人们并不知道。在认识论的测度边界向本体论的测度边界靠近时,往往难以分清,人们到底是在测度原本不可测之事物,还是在提升认知能力,扩展认识论意义的测度边界。认识论测度边界的可扩展性为超越边界提供了可能性空间。

第二,科学主义信念与科学技术成功之间的互动循环。“我们的社会已经习惯了非凡的科技成果,在这样的社会里,‘做些什么’的需求往往大大超过所能提供的社会问题的建设性应对措施<sup>[5]</sup>。”

科学的发达对宏观测度也有着巨大的影响。科学史让我们相信,假以时日,我们总能发明出更好的测度方法,总能测度到我们想要测度的东西。无论过程如何艰难,测度能力的强化进一步刺激了人类超越测度边界的欲望。

英国物理学家布莱恩·里德雷指出“数学早已渗透到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中。”“现如今,量化已经相当普遍。科学主义遵循着传统诫命,认为不能量化的东西就是无意义的。试图通过消除对常识的需要而惠及人类。曾经需要专家来评判的价值,现在重新进行量化定义。性质可以被测量出来。统计指标和统计偏差提供了评价标准,个人天分在相当程度上被抹平了。可以说,数学已经无孔不入。”“主流意识形态无疑是,一切事物都必须变得像物理学那样,有着像数学一样的客观性和精确性。”“通常的辩护是,这是为了提供一种就稀缺资源分配达成一致的客观方法。”

“然而,要想把这些研究变成一种自然科学,将要求有许多相似的社会存在,才能进行比较研究。

这样一种系综并不存在,而且在那些业已存在的社会中进行广泛实验室不可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数学的作用是有限的,忘记了这一点便是滑入了科学主义。”“在当前的准宗教气氛下,建议使用一些常识方法,而不耗费资源来进行一些可能导致破坏、改变被测量者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毫无意义的测量,很可能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如果我们知道应当如何把测量行为对被测量者的扰动减小到最小,情况也许会好一些。但在做不到这一点时,很难说所获得的结果有什么意义<sup>[8]</sup>。”

第三,多数宏观信息属于公共产品,故而不容易明确其有效需求。在市场中,私人产品的有效需求相对而言比较容易确定。而人们对公共产品的“购买”是用税来统一支付的,纳税似乎让纳税人取得了随意“点菜”的资格,他们认定自己有权力对公共产品提出各种要求,而不必再像在商场购物那样小心选择。其实这也是一种“公共地的悲剧”,但过度的需求会给政府统计部门造成不小的政治压力,驱使他们“超水平”地发挥作用,越界测度也会成为一种选择。

布莱恩·里德雷论述了大自然运行中的最小作用量原理“作用量被保持得尽可能小,或许是由于大自然具有一种经济性<sup>[8]</sup>。”然而反观经济界,人们在测度时却无所不要,违背了大自然运行的经济性,表现出明显的公共地的悲剧效应。

第四,信息公司寻求品牌效益。市场经济进入信息时代,企业也努力提供信息产品。信息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权力,先声夺人,更容易形成巨额的品牌效益,比如世界三大评级机构就垄断了对金融信用的评级。这时候,利润也成了驱使人们越界测度的强大动力。

第五,长期社会分工所造成的统计文化隔阂。从宏观测度的角度来划分,社会无非由三种人组成:从事测度者,使用测度者和为测度提供原始数据者。其中后两种人又有重叠。显然,无论从数量还是社会地位看,信息使用者都属于强势群体。专业分工久了,各自都容易只从供给或需求的立场来行事。如果使用者过度要求,尽管供给者疲于奔命,即使提供原始数据者怨声载道,还是会造成对宏观测度边界的无意识,也就势必越界。

## 七、宏观测度越界的可能后果

对可否超越这个问题,不同意义的测度边界,就

应该有不同的答案。本体论意义上的测度边界不可超越,越界测度只能是误测。认识论意义上的测度边界扩展是社会进步,通常应该鼓励对原有边界的超越。至于操作意义上的测度边界则不能结论先行,是否应该超越当视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条件而定。

不当越界,测不可测之事物,测不该测之事物,并不是社会的真实进步。

麦肯锡(Mckinsey)公司的管理顾问不承认测度的边界,他们有一句名言:任何东西都是可以计算的,只要可以计算的东西就可以管理<sup>[3]</sup>。不言而喻的是接下来的推论:任何东西都是可以管理的,这才是他们真正想强调的。显然,这是管理咨询公司为自己拓展业务的极端片面之辞,有人将这类倾向归结为“麦肯锡谬误(Mckinsey Fallacy)”。

对于任何事物,人们总可以计算得出一些数据,这种结果似乎鼓励人们跨越测度的边界。然而,可计算出一个结果不等于可测度,二者不能混淆,关键是所计算结果的意义。只有测度那些可测度的事物,其过程和结果才有社会和经济意义,硬去测度原本不可测度的事物,往往容易得出似是而非甚至错误的计算结论。

20世纪后期以来,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有社会学转向、人文科学转向和环境科学转向的趋势,在方法论上又有物理学转向和自然科学转向的趋势,这两大趋势并存,一方面研究对象越来越复杂,另一方面又要求研究的结果更加精确和清晰,相悖的力量造成了宏观测度必要性与可能性之间的高度紧张。这种紧张是造成当前宏观测度种种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失误的宏观测度信息,会误导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会破坏政府统计和政府整体的公信力,其负面影响将是相当久远的。应当指出,“计划一切”之所以不可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测度一切”。如果说“计划一切”是人类“致命的自负”,那么“测度一切”也是这种自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认识事物,很多时候并不是仅仅为了了解世界,而是为了更科学地进行决策。在现代社会,宏观测度得到的信息不仅仅为政府部门需要,企业界、民众、科学界、媒体都会有其需求。如果宏观信息失误,不仅会误导人们的认识,进一步也会误导人们的决策,造成对社会运行的巨大破坏。

社会可用于宏观测度的资源是有限的,不当越

界测度,就会造成本来已经非常有限的资源的浪费,还会影响更有用的宏观信息的采集。这一点与宏观测度的得失悖律有关,我们还将专题论述。

总之,误导认识、误导决策和浪费资源是不当超越宏观测度边界可能造成的三大危害。本来,即使在测度边界之内收集信息,也完全可能出现失误。而越界测度,超出人的能力和资源约束行事,失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 八、明确宏观测度边界悖律的意义

观测度的边界悖律的意义重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宏观测度应该树立并保持清醒的“边界意识”。

测度不可为所欲为,不能想到哪里就测到哪里。无论是从事测度者,还是使用测度者,对测度边界都应该有足够的警觉。每次测度都需思考是不是在测度不可测之事物。

对使用测度者而言,须知测度者有所不能,这往往是人类能力之限,特别是对本体论意义上不可测度的事物,谁也不可能越界而得到哪怕是接近于真实的测度结果。不能过分地提出要求。

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说“经济学并不是自成体系的学科,它是从超经济学(meta-economics)派生出来的一套思想。如果经济学家忽视研究超经济学,或者更糟,至今还不明白经济学计算法的适用性是有界限的,那他就可能犯中世纪某些神学家同样性质的错误,这些神学家曾试图引用圣经上的话来解释物理学问题<sup>[10]</sup>。”

对从事测度者而言,往往需要顶住越界驱向的巨大压力,勇于承认宏观测度在某些场合的“无能”,从而可以真正科学地测度,克服人类本性中某种“致命的自负”。

第二,勇于探索测度创新但慎于变革。

出于动态对比的要求,宏观测度中的指标不能轻易变换。而且,与其他学科相同,传承性(以求继往开来)才是学科发展的人间正道。对已有的测度方法及其成果,当然不能盲目崇拜,不能搞放之四海而皆准,对其前提,也即局限性,要有充分的警惕。同时,也要有足够的尊敬,不能轻言放弃。

测度指标不能说换就换,新替代指标的有效性究竟如何,应该有系统的科学的论证。特别是在涉

及测度范式转变时,更须慎重。

第三,对任何指标方法及其结果不能过度解读。

过度解读可能有两种方式,或追捧或诋毁,无所不用其极,无论是从事测度者,还是使用测度者都不该这样做。

在这个问题上,从事测度者有更重要的责任,对所公布的测度应该有方法论的交待。主要是测度的内在机制,为什么可以如此测度,其前提条件和有效边界是什么。

一个指标在某些方面不理想,这完全是正常的。任何一个测度,其长处和短处都是共存的,二者不可分割。对某一测度的评价应该有更专业的态度。

第四,有利于明确确立测度项目的社会大背景。

宏观测度项目的确立其实是一个博弈过程。对博弈各方而言,无论对从事测度者、使用测度者,还是为测度提供微观信息者,明确宏观测度的边界悖律,也就明确了确立测度项目的社会大背景。明确测度边界,可以让博弈趋于理性,各方更好地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减少不当越界测度,让宏观测度可持续地发展。

第五,有助于深入探索宏观测度的其他悖律和相关问题。

宏观测度中还存在着其他悖律。明确了边界悖律,就容易发现并更充分地理解其他悖律,及其各种悖律间的关系。

明确测度边界,还可以充分认识宏观测度中一些重要的相关问题,比如指标的替代性问题。

## 九、核算范式转换与测度边界

核算范式的转换是近些年来本领域中讨论较多的一个话题。容易忽略的是,这意味着宏观测度边界的革命性拓展。

在 SSF 测度报告中,专家们提出了一个与报告主题统一的关键信息:测度系统应该将重心从经济生产转向人们的幸福,这种转型的时机已经成熟。法国总统 N·萨科奇在该报告序言中更是极力强调测度系统的革命<sup>[1]</sup>。

显然,SSF 测度报告的主张涉及到了宏观测度范式的转换问题。

现行的宏观测度范式是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建立起来的,当时主要由英国、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国的经济学家分头探索,继而合作研究核算

体系的构建。其中最突出代表当是 S·库兹涅茨和 R·斯通,S·库兹涅茨以国民收入统计系统创新为要,而 R·斯通则长于核算体系的集成,因而这个“现代国民核算范式”也可以称之为“库兹涅茨-斯通范式”。

21 世纪来临之际,美国一批著名的学者回顾以 GDP 为代表的宏观测度系统,认为这是 20 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现代国民核算范式采用了复式记账法,以国民收入核算为核心,吸纳了投入产出技术、资金流量分析、国家收支统计、资产负债账户等方面,形成了国际可比的官方统计标准。原来流传的配第范式存在着民间自发性、内容狭隘性、估算间断性、方法差异性等问题,这些问题由新范式得以克服,故而可以将其视为人类对宏观测度边界的重大拓展<sup>[6]</sup>。

时至今日,现代国民核算范式遇到了社会发展的严峻挑战,其实,它在创建之时也并不是那么完美的。但如果范式确实需要转换,那就应该明确原有范式的核心问题所在,并将新范式如何解决此矛盾的优势和可替代性展开系统论证。

罗德·希尔和托尼·迈亚特在《反教科书经济学》中说:“真正的问题永远是,一个模型相对于另一个模型,其运行究竟有多大程度的优势;一套假说相对于另一套假说,运作起来究竟有多大程度的改观。事实上,一个运行不良的模型不会被摒弃,除非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替代模型<sup>[7]</sup>。”

然而在 SSF 测度报告中,我们还读不到所希望读到的内容。笔者认为,SSF 测度报告存在以下不足:①过多讨论宏观测度应该做什么,较少讨论当今的测度能够做什么。②过多讨论宏观测度中存在的问题,较少给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③问题和建 议之间还存在许多断裂,缺乏足够的逻辑支撑。④忽略了常规统计与专题调查的区别,没有对新建议测度项目的成本估计,实地操作的可行性研究不够。这四项不足都关系到测度范式革新的可行性。

## 十、替代测度的有效性问题

当然,部分学者对测度的边界,即事物的不可测度性有所警觉。当一个事物明显不可测而又需要测度时,他们会尽力寻求一个替代指标或项目,间接地去测度哪个原本不可测或难以测准的事物。可以说,对扩展认识论意义上的测度边界而言,替代测度

是一个相当有效的办法。

这时,“宏观测度的边界悖律”就演化为替代测度的有效性问题:替代测度与原测度是否等价,或者在多大程度等价,宏观测度的替代在什么意义上是可以成立的。

前面我们提出了测度与估计的区分,估计即是测度的一种替代。就难以测度的对象而言,如果一定要取得其信息,估计就是一种替代的办法。从宏观测度中包含的估计成分看,许多指标都是替代指标。甚至可以说,凡指标都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多数指标并不是所欲表征事物的直接测度。比如,人们最为熟悉的GDP就是一个替代测度,无论从指标还是从其组分看都存在替代性。

从经济内涵上看,反映一定时期经济成果的总量指标本来应该是国内生产净值。但NDP的计算需要考虑固定资产消耗价值的扣除,在实际操作时这又需要估计(而不是测度)其使用寿命的长短和损耗速度的变化,这势必包含了假设前提。相比之下,采用GDP,一方面扣除了中间消耗的重复计算,另一方面又避开了计算固定资产消耗价值所需要的假定因素,时效性也得到了提高,故而取代了NDP,成为经济总量中的核心指标。

我们再来看GDP的一个重要组分,保罗·海恩等曾分析过GDP核算中利润指标的替代性。

“企业家真正在乎的是经济利润,因为经济利润评估供给生产的企业家资源的机会成本。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利润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中一个重要的概念的原因。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企业家对于经济利润的追求是市场进程的推动力。”

“经济利润一般低于会计利润。但是,为了计算GDP,只有会计利润被用来计算经济绩效。GDP核算人员不可能确定美国所有企业家的隐形成本或机会成本。没有哪个核算人员和经济学家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论好坏,他们根据的是由经营者和公司上报的官方的核算利润,即使会计利润确实会产生经济亏损。从这个角度看,看待经济中产生的所有‘利润’收入的国民收入核算时,是要大打折扣的。由于基本上假设企业主拥有的资源是免费品,GDP

核算中的利润总量一定是被整体高估了<sup>[5]</sup>。”

如果说GDP指标确有值得批判之处,会计利润对经济利润的替代应该是一个核心问题。不过在更有效的测度办法产生之前,我们在常规统计中不得不仍然使用这一替代。

需要注意的是,测度替代也存在着自强化性质。本来是特定条件下的权宜之计,具有暂时性,但在推行指标时往往强调其可行性,容易让人们忽视其替代性质。原来的实践者渐忘之,而后来的参与者不明就里,误解其原由,将暂且的替代当成了原测度本身,可能会使替代测度出现长期化甚至永久化的倾向。故而,我们在认识宏观测度的边界时,对指标的替代性应更加重视。

#### 参考文献

- [1] J. E. Stiglitz, A. Sen and J-P. Fitoussi, Mismeasuring our lives: why GDP doesn't add up[M]. The New Press 2010.
- [2] Zoltan Kenessey, The Accounts of Nations[M]. IOS Press, 1994.
- [3] D·博伊尔. 为什么数字使我们失去理性[M]. 黄治康, 李蜜译. 四川: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 [4] W·配第. 政治算术[M]. 陈冬野等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78.
- [5] 保罗·海恩, 彼得·勃特克, 大卫·普雷契特科.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M]. 马昕, 陈宇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8.
- [6] 邱东. 国民核算史论[M]. 统计研究, 1997(4); 谁是政府统计的最后东家,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3.
- [7] 罗德·希尔, 托尼·迈亚特. 你最应该知道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荒谬[M]. 夏愉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1.
- [8] 布莱恩·里德雷. 科学是魔法吗? [M]. 李斌, 张天卜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9] T·克伦普. 数字人类学[M]. 郑元者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 [9] 奥古斯特·孔德. 论实证精神[M]. 黄建华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96.

#### 作者简介

邱东,男,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民核算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统计与核算。

(责任编辑:平凡)